

从古代旅游到现代旅游:以旅游与卧游的关联为线索

庞学铨 方 芳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中国古代旅游的研究意义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从汉语“游”一词的语义发生、转变、深化的历史入手,可对这个问题有所观照。旅游具有游文化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内涵:在共时中,旅游保留了游的哲学、美学意味;在历时中,足不出户的“卧”与失其本居的“旅”对立,构造了卧游与旅游之间的关联。在对游史的研究中发现,宗炳通过对旅游的感悟,改造了古代道教的卧游养生术,形成了卧游审美观、哲学观。而在晚明,卧游的世俗化也与现代旅游的兴起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卧游在中国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的意蕴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卧游也成为旅游想象,融入现代旅游实践和旅游体验之中。

【关键词】卧游;古代旅游;现代旅游;山水画;旅游手册;宗炳

一、引 言

任唤麟在《中国古代旅游研究综述》一文中回顾了近百篇古代旅游研究的文章后指出,“古代旅游研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对这一问题支吾不清的回答使研究古代旅游的学者少了许多‘底气’,以致缺乏学术使命感,甚至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1]124}。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虽有研究者考证中国古代旅游的历史孕育于先秦两汉,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唐宋元,兴盛于明清^{[2]324-361},但它的实践特征与现代旅游的实践特征确有不忽视的显著区别。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强将旅游活动扩大化,把中国古代旅游作为现代旅游研究的一部分既无必要,也无实质意义^[3]。更有研究者批评,中国古代旅游研究者通过混淆旅游与旅行的区别,“以期用已知的旅行史料来填补旅游史料缺乏的空白”^{[4]88}。这些批评和质疑集中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之间关联性的认识问题:二者是完全断裂的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反映了对中国旅游发展史的认识,也决定了对中国古代旅游研究意义的态度。本文试从“游”的语义发展史入手,辨析中国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之间的关联、转承与延续关系,探寻中国古代旅游对现代旅游的价值,以期探讨中国古代旅游研究的必要性与意义。

本文的策略不是从考古学、发生学的角度考证旅游的发展史和研究史,而是从语言学探求“游”

【收稿日期】2019-05-1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20-12-05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 33-6000/C

【作者简介】1. 庞学铨(<https://orcid.org/0000-0001-7368-865X>),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休闲学、现象学研究;2. 方芳(<https://orcid.org/0000-0001-7096-7717>),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休闲旅游学、现象学研究。

这个词的意义发展史,以期突破外部特征研究的传统路径,从内部联结中国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中国旅游史研究受到研究范式改变的外部影响,旅游从一种古代文化现象变成一种现代经济现象,从而造成了前后不一、逻辑混乱的内部断裂。但是,学科视角变化所产生的研究历史的断裂,不会影响语言符号的实质性含义、意义的传承。梅洛-庞蒂说:“我们建议把文化或意义范畴当作一种发生的最初范畴,如果发生存在的话,那么它必然不是来自纯粹事件的发生,也不能被当作巧合的简单结果。如果人类活动的特点是在他的实际单纯存在之外进行表达和提出一种意义,那么可以得出,任何一个活动与其他活动都是可比较的,它们都属于一种唯一的句法,任何一个活动都是一种开始(和一种继续),预示一种继续或重新开始,因为活动不像事件那样关注它的差异和一劳永逸地完成,因为活动在它们的单纯呈现之外仍有价值,因而活动已经是所有其他表达尝试的同盟者和同谋者。”^{[5]82}据此,笔者从“游”一词的意义发展史出发,将古代旅游活动从个别性中解放出来,向游史的普遍性开放,研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变形的发生,力图找到研究断裂的点,然后重新联结它们。把旅游放入游的意义发展史中去考察,能更清楚地看到现代旅游是如何从古代旅游中发生的,进而揭示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之间的关联。

二、游 史

当代学者对古代旅游的归纳包括游观、游豫、游猎、游学、巡游、宦游、商游、卧游及朝山进香、民间节事等旅游与休闲活动。这些词虽都被归为古代旅游,但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任唤麟等将之分为功利型旅游与审美娱乐型旅游^[6],大体对应的就是构词法中“游”的前置与后置。它们都是由修饰语与中心语组成的结构:前置“游”,是以游为手段,以达成某种目的,也就是功利型旅游,包括游牧、游士(游学、游说)、游于艺、游人、游世;后置“游”,则是以游为目的,有审美娱乐的意味,如逍遥游、神与物游、优游、卧游。因此,游在词语的表达上不仅具有相同内涵的共时性的统一含义,还有相互区分的历时性的生成意味。笔者将之称为游史。它不是依据时间顺序发展的考古学的历史,而是这一词本身的内涵在人类语词发展过程中共享与生成共存的表述发展史。

(一) 游的发展史

游史发展有四个部分:身体的空间位移;“游一居”结构;精神自由;人生境界。前两个部分强调游作为手段,后两个部分则以游为目的。

中国古代是“充满了各类游人流民以及游之活动的世界”,“游人及游的互动,显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丰富的精神状态”^{[7]5}。游首先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表达出现的,它是身体的空间位移,最初用于记录先民的延续和生存迁徙。“游”,说文解字注曰:“旌旗之流也。”旌旗是氏族迁徙出游时所举的代表氏族徽号的旗帜。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先秦之前的游的记述大多都是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了黄帝游走四方的足迹:“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8]7}《周易·系辞下传》亦谓黄帝“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9]292}。《诗经·大雅》中也叙述了公刘迁豳的迁徙、开垦、安居的情况。这些史料都印证着那个时代先民的游历多是为氏族生存而奔波。

先秦之后,居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游就成为一种与居相对的人类生活状态。此时的游在文学作品中通常意味着对现有生存环境及生存状态的突破和超越。这种含义也存在于西方文学作品中,如西方的“游牧者”,它在文学作品中总是带有一些浪漫色彩,比如《卡门》中的吉卜赛姑娘,也在一些社会学研究中被当作社会中的他者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素^[10]。因此,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

西方文化中,游都意味着在“游一居”结构之上,对当下生存环境及生存状态的突破与超越,甚至对日常社会结构的反抗^[11]。综上所述,游的原初的、围绕身体实践的内涵有两种:身体的空间位移和“居一游”结构。

伴随氏族迁徙出游的,是先秦文学对迁徙过程中所见所闻的描述。这些文学作品构成了游的另一种含义,即精神随着身体之共游。《庄子》《楚辞》《诗经》等先秦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对观光游览活动的记载与描述,如《诗经》中有《大雅·卷阿》《卫风·竹竿》《郑风·溱洧》《秦风·终南》等反映古人游乐旅行的诗篇。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游进一步发展出精神境界、生命体验的意涵,用于指代精神突破了时空限制的自由,彰显了自然审美意趣、政治品格和道德理想,诞生了“一种中国人对于人生的诗性领悟,一种中国人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生存方式”^{[12]194}。随着游的概念逐步深化、独立,它不再侧重强调身体移动,而以精神境界的文化内涵进入主流社会文化结构之中。游意指精神层面时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第一,用于表述以一种超然的、出世的态度入世,彰显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品质。成为不择国而仕的“游士”是先秦知识分子阶层坚持和固守自我道德情操的一种选择^{[13]42}。比如,孔子为弘其道曾周游列国,历时数十载。他的弟子们也“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而孟子也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第二,游的状态是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追寻道德理想的路径,游是他们实现道德理想、身体力行的实践。如孔子反对游的反面即安于现状、怀恋故土,提倡君子应当超越对故土的怀恋,“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第三,用于表述纯粹的精神世界完善和自我道德追求,意为“心灵的逍遥、精神的容与”^{[14]27},如庄子的“逍遥游”。第四,用于表述艺术创作的“神与物游”方法论,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无论是道家的“逍遥游”还是儒家的游士,都强调与天地精神、道体德性的联通,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旷达,是个体意志与理想存于天地、大道本体层面的天然意识。综上所述,游在精神层面的意蕴极为丰富,既是对自然景观的审美之游,也是为实现其道德理想的身体力行的实践;既是纯粹的精神世界的完善,也是艺术创作实践的方法论。

(二) 游史中的旅游

以游的含义演变史为观照,可以对旅游的共时性和历时性意蕴分别做以下理解:

首先,从共时的角度看,旅游共享了游的核心含义,与具有类似结构的词有区别地联系在一起。“旅游”的构词法是用“旅”表达失其本居的状态,“游”虽也有表达身体移动的含义,但侧重强调的应是精神之游,类似的词语包括逍遥游、神与物游、优游、卧游。如此,“旅游”一词的内涵就较以往的内涵扩大了。研究者通常将旅游等同于旅行和游览之意。这一简单的含义拆分、叠加虽然可以解释旅游的部分内涵,在大多数场景下也能够承担研究之需,但它隐去了游的精神追求,把旅游变成游览,简化了“旅游”一词的内涵。须知游览大多是欢愉的,而旅游之游却未必强调欢愉的感受,而是侧重强调精神状态。如《文选》中一些游览类诗歌抒发了诗人欢乐的体验^[15]。如《游东田》:“戚戚苦无惊,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16]318}而直接使用“旅游”一词的诗歌却是包含了愁苦体验即旅愁的,如最早使用“旅游”一词的南北朝时梁朝沈约的《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嚶起稚叶,蕙气动初苹。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17]900}又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一诗:“江海飘飘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

其次,从历时的角度看,不同的前置状语修饰“游”,表述具有差异性的游的对象、方式和状态等等。比如,“逍遥游”的状语“逍遥”,指的是心灵的逍遥,意指个人的精神追求,包括纯粹的精神世界

的完善和自我道德的追求;而“神与物游”的状语“神与物”,指的是对象性的神思与物,所以,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神与物游”用于论述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同样,“旅游”的前置状语“旅”表达了身体的一种状态。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写道:“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18]228}

(三) 游史中的“卧—旅”

游史中的旅游不是孤立存在的。古代旅游的种种形式中,有多种修饰游的前置语可与“旅”区分开来,如巡游、宦游、商游、卧游等。其中,宦游、商游等用“宦”“商”表述事务性出游,巡游则侧重于察看、巡视的含义。而“卧游”与“旅游”的构词法非常相似,都是通过描述身体状态的状语来修饰游:“旅”以游之;“卧”以游之。失其本居的“旅”与足不出户的“卧”正好相对。因此,对旅游与卧游区别和联系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旅游意蕴的变化过程,为考察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之间的关联提供路径。

三、从旅游到卧游

卧游最早出现在道家经典中。“酣卧以游”强调的是一种酣卧、醇醉的实践样式,以达到恣意、混沌、飘忽的精神状态。卧游之“卧”强调的是一种身体形态;卧游之游是“身隐心游”,一种超然的精神状态。道教养生术还强调了“象”在卧游中的地位。人在“定卧”时容易精神涣散,为了人在卧时还能凝神聚精以达养生延年^{[19]1737},象的介入尤其重要。这个象包括了屋内的悬像和精神的想象,作“存思、守一”之用。借助屋内的悬像,“心有所寄,庶不外驰”。道教养生的卧游所用之悬像被称为《存思图》,一般以神灵的幻象为主体。这种起源于达道和养生的卧游实践在南朝时期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其中,宗炳的旅游爱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者们一般认为,宗炳卧游的原因有二。一是身体的桎梏。宗炳一生好游观山水,晚年时却因病被困居江陵,才有了卧游的想法。“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20]2279}二是宗炳继承了道教的养生观,宗炳是因年老,“愧不能凝气怡神”,所以需要卧游观象,守住精神,以抗衰老。前者直接指明了宗炳的卧游是对旅游的替代。后者初看是对达道和养生的传统卧游观的继承,实则是从旅游体验中汲取新的生命力。因为《存思图》大多都是道教中的神仙图,而宗炳卧游所借助的象不是幻象,而是山水画册。显然,象的内容变化是宗炳本人从对山水的旅游体验和感悟演化而成,促使宗炳《画山水序》的产生。《画山水序》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深远,它论述了“张绡素以远映”的描绘山水透视法^[21],更融合了儒、道、佛等传统中国哲学^[22]。“山水之形媚道”,“山水”借由人的体验以象实存,使得山水之象与山水画之象共通,所以,在“澄怀”“味象”中,卧游也可“观道”。

总的来说,卧游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23]:第一阶段,达道。在这一阶段中,卧游之卧是一种身体活动,通过酣卧以通达游的境界。第二阶段,养生。养生的目的提高了对“象”的重视,“观象神思”以达精神的存思与守一。第三阶段,以宗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卧游实践,完成了卧游的内涵从达道养生到审美超越的转变。卧游与古代旅游的关系在于,宗炳从他的旅游感悟中汲取了“澄怀观道”的意义和价值,开创了卧游与“山水之形”结合的方法,完成了卧游从达道与养生到审美超越的转变。而后以卧游实践替代了旅游实践,以山水画册替代了《存思图》,最终通达了以游山水为核心的古代旅游体验。卧游是从古代旅游中发展出来的,没有士人阶层对旅游活动的感悟、对卧游的改造,卧游就只是一种道教养生术。卧游内涵的形成、地位的确立,关键因素在于宗炳通过旅游感悟对道教卧游养生的继承与改变,使卧游成为旅游的替代品。第四阶段,晚明卧游

的世俗化。社会经济发展,商业氛围浓厚,导致山水画等出版物中象的隐匿及旅游手册的兴起。研究者一般把卧游发展的第四阶段称为卧游的肤浅化。在晚明后期,大量以卧游为名的山水画册的肤浅化,失去了艺术内涵,成为现代旅游的信息载体——旅游手册的雏形。于是,在现代旅游意义的发生中,卧游又与旅游关联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卧游对现代旅游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现代旅游的萌芽与卧游的世俗化

现代旅游的萌芽与卧游的世俗化都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学界认为晚明时期就已经存在现代旅游的萌芽,它表现为晚明旅游风气与中国古代旅游的差异^[24]、与现代旅游的相似^[25]。下面通过对晚明旅游风气与现代旅游萌发的成因关联的分析,揭示卧游在现代旅游形成中的作用。

(一) 现代旅游的萌芽

晚明时期是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时代。社会风气的巨大变革,商业环境的兴起,使劳动实践、休闲方式、生活理念孕育着现代观念。其中,晚明的旅游风气是非常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晚明的旅游风气与之前的游览不同。余贵棠《中国人之游览观》一文对中国古代旅游观念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他将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总结为:出世的而非入世的、静止的而非活动的、个人的而非大众的^[26],明前期的旅游阶层只包括贵族阶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少数几个阶层,通常有专有名词指称特定阶层的旅游活动,比如游豫、游猎、巡游、宦游、游学等等。而晚明的旅游则是入世的、活动的、大众的,晚明文人的旅游之风是纵性任情、寻欢逐乐、不计时日、不计金钱的^[27]。晚明的旅游者之中不仅有文人雅士,也有商人、妓女等形形色色的游客,包含了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28],出现了“都人士女”聚游与“举国若狂”的景象^[29]179。“这是前所未有后所罕见的现象。在唐虽有游人,而多数留连光景,作为诗料;在宋游风已经稍杀为少数;在清代几乎萎缩到只有极少数人才热爱山水。而晚明却是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30]173

有很多研究者从经济的角度论述了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31]、商品经济对旅游环境^[32]的渗透,指出晚明的旅游实际上就是现代旅游的萌芽。但笔者认为,直接标识现代旅游产业特征的,是现代旅游的核心要素——交通和信息的大发展。旅游产业规模的大发展是以交通工具的变革为前提条件,以信息产业的推动为充分必要条件。现代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可追溯到1949年喷气式飞机用于民航,它标志现代全球范围的旅游产业的兴起。而信息作为旅游产业的生命线,分为旅游手册的出现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两个阶段。旅游信息(包括旅游目的地信息、交通信息、价格信息等)促使旅游壁垒的逐渐消失、旅游成本的大幅下降、旅游动机的全面激活等现代旅游产业基本特征的形成。以交通和信息两个要素来看,与卧游的肤浅化相关的晚明旅游风气实际上就是现代旅游产业的雏形。

晚明交通运输方面较明中叶以前确实有许多新的进展,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三个方面:非官方的民间交通线路更多、范围更广,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已然形成;水陆联运、夜航船等新业务出现;服务于交通运输业的其他相关产业出现等^[33]3。晚明交通条件的发展是旅游风气形成的前提^[29]176。然而,研究者很容易忽视旅游手册对晚明旅游风气的形成的核心作用。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商业经济的发达,还是交通条件的大发展^[34]53-54,都只是旅游风气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只有直接与旅游相关的信息的产生、传播,才能揭示大众旅游的基本特征。旅游手册才是现代旅游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旅游手册的产生与卧游的肤浅化直接相关。

(二) 旅游手册与卧游的世俗化

明末尤其是万历以后,迎来了一次信息革命。出版业从注重质量的限量印刷转变为数量剧增的海量印刷^[35]³⁷,刊刻书版的劳动力成本下降、书籍生产成本下降、书籍价格下降,使得出版陡然兴盛,受众大量增加^[36]¹⁵²,社会舆论和新潮思想都得以借助出版物这个媒介传播。晚明旅游类出版物可分为两种:一者,以游记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二者,名为卧游实为旅游手册的山水画册。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游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一直是文学作品的附属品,不具有非常典型的现代旅游特征。而旅游手册不同于旅游文学,它是专门服务于旅游活动的旅游信息,只为引导、激发旅游动机本身而存在,不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虽然也曾有学者指出,方志具有旅行指导的作用^[37]⁶,但方志是史料,主要是记载地方历史,而非纯粹服务于旅游。旅游手册的出现才是现代旅游的标志。现在公认的第一本旅游指南,是“现代旅游之父”英国人库克在1845年整理出版的《利物浦之旅》。然而,在晚明的卧游世俗化过程中已然诞生了旅游手册。以当时大受市场欢迎的《新镌海内奇观》为例^[38]³⁷⁶⁻³⁷⁷,它虽借了卧游之名,却无卧游之实;虽不以旅游手册自称,却有旅游手册之功效。

万历三十七年(1609),杨尔曾雇人精心绘制了130多幅山水风景画,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由钱塘夷白堂刊刻出版,名为《新镌海内奇观》^[29]¹⁷²。这本书的序邀请了当时颇具盛名的陈邦瞻、葛寅亮、方庆来撰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这本书与卧游联系在了一起。方庆来在序言中指出了这本书的两种功能:“彼卧游者,漫劳车马,睹胜景于掌握之中,不出户庭,畅幽情于画图之外。即身游者,可按图穷致山川之奇,不至于湮没于当局矣!”但是,《新镌海内奇观》的传统卧游功能已然衰落,只剩旅游手册的功能了。因为卧游者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可以在山水画中体验精神趣味的士人,而《新镌海内奇观》一书的读者变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广大民众。卧游的山水画册具有极高的美学境界,《新镌海内奇观》一书的内容则变为满足大众对热门旅游景点的向往与好奇的插画。卧游是通过“味象”达致“畅神”和“万趣融其神思”,即景致与精神的融合,《新镌海内奇观》一书则变为刺激大众旅游的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旅行指南,用以激活不同阶层之人的旅游动机^[39]。以《新镌海内奇观》《西湖卧游图》《金陵图咏》等为代表的晚明山水画册中的山水画已然丧失了卧游的笔墨趣味,更非独立的、作为艺术作品的风景名胜画,只是借卧游之名提升它的价值,成为旅游信息载体。晚明旅游手册是现代旅游萌芽的标志,这一点与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旅游在中国出现的时机要早于19世纪相符^[3]。我们可以把《新镌海内奇观》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旅游手册,它比英国人库克整理出版的旅游指南《利物浦之旅》早了200多年。

卧游之象从作为艺术作品的山水画变成作为信息载体的旅游手册,其根本原因在于古代卧游依赖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宗炳《画山水序》的观点是在绘画技术不完备的情况下,由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开宗明义地提出的^[22]。它不是绘画技术经过积累后,通过归纳、总结所得出的理论,如魏晋顾恺之的“传神论”人物画理论,而是理论的横空出世,从而促进了绘画技术的发展^[40]。究其原因,“山水之形”不来源于山水,而来自士人阶层游山水时的精神世界;“澄怀味象”之象不来自名山,而来自宗炳游山水时的“澄怀”之“味”。而旅游风气的改变,晚明活动的扩大化,游山水的审美意味降低,都让山水画变为旅游手册成为一种必然。与此同时,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版商的附庸风雅,出版物水平良莠不齐,造成了作为旅游手册的山水画的风靡,进一步推动了卧游的肤浅化、庸俗化和晚明旅游风气的发展。总而言之,卧游之象从“山水之形”的艺术品变成作为山水信息载体的旅游指南^[39],推动了现代旅游萌芽的产生。

五、从卧游到旅游

卧游与现代旅游之间的关联在于旅游手册的诞生增加了旅游信息这一核心要素。有学者认为,在晚明登峰造极的旅游风气中,虽然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发展,但尚未发展成一门新型的社会经济产业,因此不足以构成晚明旅游近代化的课题^[32]。但是,旅游信息的传播彻底改变了古代旅游的特征,引领着古代旅游向现代旅游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卧游的衰落和演化扮演着重要角色。下面分别从信息对旅游动机的改变、卧游样式的旅游想象以及卧游的研究对现代旅游研究的意义,阐述中国古代旅游与卧游相互作用、融合,共同构成现代旅游内涵的过程。

第一,卧游的山水画册从外部推动了旅游动机的产生,在以内部推动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旅游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动机“推—拉”模型。从伦理和审美的角度,我们很容易把现代旅游视为古代旅游的肤浅化,因为“中国的古代旅游有着追求人格完善与人生完善的伦理要求”^[41]¹⁾,注重审美感受和道德修养,重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交融^[42]。但从主体性动机发生的角度看,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的差别在于推动力的不同,前者是内在拉动型,后者是外部推动和内在拉动并举。宗炳的卧游实践说明,士人阶层的旅游动机来源于主体,是一种身体与精神双重超越的实践;晚明登峰造极的旅游风气并不是由于晚明士人阶层扩大,或者时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本质的飞跃,而是由于以旅游手册为代表的、作为现代旅游产业生命线的信息的出现^[43],从外部促进了旅游动机和旅游消费文化行为的产生。因此,从中国古代旅游到现代旅游,是动机从以内部为主导到内外并举。这种变化不仅不会湮没古代旅游的研究意义,还会帮助现代旅游识别内部动机,中国古代旅游的研究则为内在拉动力的识别提供了途径。

第二,信息促进了旅游想象,形成了卧游的当代样式。晚明的卧游肤浅化是否意味着卧游的消失?答案是否定的。山水画集从象到信息的转变,不仅促进了古代旅游到现代旅游的转变,而且改变了卧游的某些特征。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旅游看成古代旅游的肤浅化,卧游的世俗化和消亡也需以发展的眼光进一步分析。卧游之所以可以替代旅游,山水画集之所以可以替代山水,是因为在以卧游畅游天地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眼中,山水画体验与实际自然景观体验并无根本性的差异。艺术作品体验和旅游体验在知识分子阶层高超的生活技艺之中是共通的,这一生活技艺的本质就是想象。想象帮助宗炳逃离了环境的桎梏,畅游天地。没有想象,艺术作品也会退化为旅游手册,借助想象,看信息也可以卧游。现代旅游研究肯定了旅游想象对旅游的促进作用^[44],因此,各式各样的信息所激发的旅游想象正是卧游的当代样式。

第三,卧游作为游史中的一种实践方式,对现代旅游体验研究、旅游哲学研究有着突出的重要意义。旅游体验研究是当代旅游研究的核心,学者们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现象学等方法,以期揭示旅游体验的本质。在梳理了古代旅游到现代旅游的转变、肯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之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古代旅游对现代旅游体验的研究意义。虽然古代旅游缺乏系统性的理论记载,但是有过旅游经历的士大夫阶层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绘画、书法等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是士大夫阶层“诗意栖居”的表现,它们保存了最为纯粹的山水旅游体验,因而极具研究价值。其中,卧游作为非常典型的中国古代审美活动,为士大夫阶层所推崇。卧游与旅游的联系可以归纳为:圣人含道,贤者观道,旅者伴道;“游之”是旅游的自然境界,“澄怀”是休闲旅游之功效,“味象”则是旅游体验之源。

六、结 语

西方学者陶纳(Towner)认为,西方古代旅游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思辨,应加强学

科间的联系,否则只能成为近现代旅游研究的肤浅“序言”^[45]。这一经验于国内古代旅游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1]。本文从游的词义发展史出发,直面中国旅游史研究的三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中旅游的含义?为什么现代旅游不是对古代旅游的直接继承?我们应当如何联结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旅游意蕴与当代旅游哲学研究?在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中,卧游举足轻重。首先,足不出户的“卧”与失其本居的“旅”构成以身体状态表达行为实践方式的天然区分;其次,卧游在南朝的宗炳时期,从中国古代特有的“旅游”活动中确立了自身的基本意涵;再次,晚明卧游随着“味象”之象的肤浅化而逐渐衰落的过程之中酝酿了现代旅游的发展;最后,卧游成为旅游想象,融入现代旅游实践和旅游体验之中。因此,以卧游与旅游的关联为观照,使中国古代旅游与当代旅游特征的区别变得明晰,考证变得严谨,也将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旅游联系了起来,使从更为深远的中国文化的游史的角度阐述旅游的意义成为可能。

卧游与旅游的关系充分揭示:现代旅游不是对古代旅游的直接继承,也不应简单地看作是古代旅游的肤浅化;汉语“旅游”所承载的含义是具有自身逻辑和独特性的,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生成和变化的,是共享了游之意涵并与其他类型的游相区分的一种实践形式,这一点对于旅游史研究乃至中国旅游研究格外重要。中国旅游史研究的困境在于研究者只是试图单线关联古代旅游与现代旅游,而没有在游史中考察旅游。游史的背景包括古代旅游实践、古代卧游实践、古代审美思想、古代休闲养生观等,它们构成了古代旅游的背景和现代旅游的意义源泉。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旅游研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在游史之中,有待研究者耐心、审慎地发掘。

[参 考 文 献]

- [1] 任唤麟:《中国古代旅游研究综述》,《旅游学刊》2014年第10期,第116-128页。
- [2] 冯乃康主编:《古代旅游文学作品选读》,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
- [3] 方百寿:《中国旅游史研究之我见》,《旅游学刊》2000年第2期,第70-73页。
- [4] 刘德谦:《群书中先秦旅游活动绎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88-96页。
- [5]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 [6] 任唤麟、何小芊:《旅游概念界定与中国古代旅游发展论略》,《旅游论坛》2011年第4期,第1-6页。
- [7]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8]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 [9] 周振甫:《周易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 [10] Steinbock A. J., "Homelessness and the homeless movement: a clue to the problem of intersubjectivity," *Human Studies*, Vol. 17, No. 2 (1994), pp. 203-223.
- [11] Scott. J. C.,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2] 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 [13] 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4] 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
- [15] 刘德谦:《旅游与“Tourism”的概念探问——旅游者活动?旅游业?旅游学?》,《旅游学刊》2017年第9期,第80-102页。
- [16] 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17]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 [1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19] 杨寄林:《太平经今注今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0] 沈约：《宋书》卷九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21] 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之空间意识》，见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筹备委员会印行，1937年，第17-18页。
- [22] 倪志云：《宗炳〈画山水序〉“大蒙”之解辨证——兼论宗炳的思想特点》，《美术研究》2015年第6期，第69-77页。
- [23] 邵晓林：《卧游的精神内涵研究》，《美术学报》2017年第6期，第108-114页。
- [24] 陈宝良：《明代旅游文化初识》，《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第258-262页。
- [25] 滕新才：《明朝中后期旅游文化论》，《旅游学刊》2001年第6期，第64-69页。
- [26] 余贵棠：《中国人之游览观》，《旅行便览》1943年第5期，第29-35页。
- [27] 魏向东：《晚明求适思潮与士绅休闲旅游》，《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99-203页。
- [28] 陈宝良：《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45-50页。
- [29]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30] 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72-78页。
- [31] 梁中效：《明代旅游的近代化趋势》，《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18-20页。
- [32] 魏向东：《晚明旅游活动的经济渗透：关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48-154页。
- [33] 巫仁恕：《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以江南为讨论中心》，见熊月之、熊秉贞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25-255页。
- [34]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
- [35] [美]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36] Anne E. M., "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Brokaw C. J. & Chow K. 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152-183.
- [37] 黎锦熙：《方志今议》，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
- [38] 魏向东：《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 [39] 李锐恩：《从“澄怀观道”到“旅游指南”——卧游观念在晚明旅游绘本中的世俗化转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97-107页。
- [40] 刘丽娜：《沈周卧游思想及对吴门画派的影响》，《荣宝斋》2013年第7期，第140-153页。
- [41] 曹国新：《中国与西方旅游的古代、现代和后现代特征》，《旅游学刊》2006年第6期，第11-15页。
- [42] 黄宏：《从古代游记散文看中西旅游文化的差异》，《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88-90页。
- [43] Novelli M., Schmitz B. & Spencer T., "Networks,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in tourism: a UK experience," *Tourism Management*, Vol. 27, No. 6 (2006), pp. 1141-1152.
- [44] Salazar N. B., "Tourism imaginaries: a conceptual approach,"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39, No. 2 (2012), pp. 863-882.
- [45] Towner J., "What is tourism's history," *Tourism Management*, Vol. 16, No. 5 (1995), pp. 339-343.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ourism in China: Changes in Connotations Between *Lüyou* and *Woyou* a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s

Pang Xuequan Fang 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ancient tourism,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of tourism as well as tourism culture, economics, and geography, is now widely available,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researches has always been problematic: lacking a clear connection with modern tourism, the

effectiveness of ancient tourism studies appears limited. Our approach to challenging this status quo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questions: Why do we need to study the meaning of tourism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Why is tourism, as practiced in contemporary China, not a straightforward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hinese tourism, so that the internal logic of its development is chaotic and research meanings disconnected? And how can we connect the path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tourism?

Starting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connotations of the character “you” (游) have formed and changed over tim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nchronicity and chron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lüyou” (旅游)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In the synchronic form, *lüyou* retains the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meaning of “you”. In the chronological state, there is a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ourism and “woyou” (卧游) that has formed through “wo” (卧). As opposed to “wo”, where one does not leave the house, “lü” refers to leaving the res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woyou* has the function of a link through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tourism into modern tourism.

In a word, modern tourism is not a direct inheritance of ancient tourism, nor should it simply be regarded as the superficialization of ancient tourism. The richnes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tourism concepts gradually changes with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aning within the same synchr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achronicity of differences. During the Tsung Ping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ractice of *woyou* took form.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urism and *woyou* continued to develop, interacting and integ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lüyou* and *woyou* helped develop a modern tourism that combine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s of the subject and the external motivations driven by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woyou* has become a tourism imaginary integrated into modern tourism practice and the tourism experience. Such an understanding not only mak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tourism and contemporary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clear and rigorous, but also lin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modern tourism and, further more, makes the integration of far-reaching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tourism possible.

Key words: *woyou*; ancient tourism; modern tourism; landscape painting; tourism handbook;

Tsung Ping

